

白鹿洞书院研究丛书之八

田 畛
翥 城 集

朱瑞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廖城集

白鹿洞书院丛书之八

朱瑞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廖城集/朱瑞熙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8

ISBN 7-5617-2479-9

I. 廖... II. 朱... III. 中国-古代史-宋代-研究-文集 IV. 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154 号

白鹿洞书院丛书之八

廖城集

著 者 朱瑞熙

特约编辑 何润香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3100

书 号 ISBN 7-5617-2479-9/K·197

定 价 2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序

言

—

早在三十多年前,也就是 1961 年至 1965 年的近四年时间里,我有幸受业于先师蒙文通先生的门下。蒙先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史学大师,而我是初出茅庐,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所以蒙先生最初对我并不中意,他几次说过他理想中的研究生,年龄应在四十岁左右,彼此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可以切磋学问。我作为蒙先生的一位“关门弟子”,初学宋史,所知甚少,自然毫无学术见解可与蒙先生“切磋”,只有诚惶诚恐地向蒙先生求教,接受蒙先生的教诲。

蒙先生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他指导学生孜孜不倦,循循善诱。我始终记得他关于做学问“要开阔眼界”的精辟见解,他说过:“学问贵成体系”,“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在他的启发下,我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不仅对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史,而且对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迷信等都加以关注。当然,要对宋代社会有全面的了解,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宋代

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必须持之以恒,方能逐步有所发现。如此日积月累,在对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整个社会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在宋史研究领域内触类旁通,使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较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事实上,穷尽一生之精力研究宋朝三百二十年的历史,知识面原已受到局限,而要在宋史范围内更深地研究其中的某一方面,看来更是艰难。

在复旦和川大求学期间,与其他学友一样,我精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通过以后长期的研究实践,我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自己宋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不过,我不是史学理论家,我的宋史研究还是应以史实为基础。于是,我的治学方法尤其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鉴于当时接二连三地开展政治运动,学习和研究工作时断时续,从老师和同学处得知最好的积累资料方法是摘录卡片,然后经过整理,分类保存。记得早在1960年,我着手撰写大学学年论文,自己裁纸制作卡片,摘录有关宋史的资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川大攻读研究生后,更是离不开卡片。1965年5月离开川大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到时,我已积累了几千张卡片。近代史所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可以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所里不仅有标准的白卡片供给研究人员使用,还配备了导片和盛装卡片的大小盒子。此外,近代史所图书室藏书丰富,一墙之隔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阅图书也极其方便。尽管从1965年9月到1972年10月,我曾经去江西丰城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在近代史所参加“文革”,又下放“五七”干校,但仍然因参加续编《中国通史》之需,阅读了一些宋代史籍,抄录了许多资料卡片。1972年10月,回到《中国通史》编写组,在蔡美彪同志领导下,参加《中国通史》第五、六、七册的编写工作,继续摘录卡片。这样,至今为止,估计积累的卡片约有二、三十万张。

最初,我在宋史方面,对经济史最有兴趣。从1972年起,因《中国通史》续写工作的需要,又系统探讨宋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逐步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产生了一些想法,认真思考应

该如何估计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文革”结束后,接连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代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的编写工作,按照分工,我承担了当时国内较少有人问津的宋代铨选、科举、学校、刑法、官制(部分)等条目。从此我对这些内容开始系统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入门到基本掌握的过程。在“文革”的“批林批孔”以及编写《中国通史》第七册哲学思想部分过程中,我阅读了各种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精读了《朱子语类》等典籍,对宋、金、元的思想史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应中华书局之邀撰写介绍宋代官制的系列文章,开始对此系统摸索,虽然这些探索不能说十分深入,但至少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接着,参加编写宋代政治制度史。正因为有了这点基础,使我在编写时驾轻就熟,减少了在官制方面出现的失误。

1979年,我开始撰写宋代社会新特点的论文。随着从社会经济到阶级斗争共十部分的逐步完成,发现要写的内容太多,篇幅已非一篇论文所能容纳。1980年,适逢上海师大(时称上海师院)召开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就将此文的提要写出,在学术报告会上宣读。此文后来由中州书画社编入“宋史研究丛书”,作为一册著作出版。该书名为《宋代社会研究》,其实只讲了半个宋代社会,其他诸如赋役制度、职官和铨选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学术、民族关系、科学技术等另外十个问题都未论及,有待日后补齐。(设想补写的篇幅,加上已经出版的部分,总字数控制在二十五万左右,目的是方便初学宋史者阅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对宋代农民起义有兴趣,一则因为参加编写《中国通史》需要这些内容,二则自己对其中几次农民起义已有研究心得,所以陆续写了好几篇论文。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我在宋史研究方面开始有了升堂入室、得心应手之感,觉得有很多问题可写文章,只是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了。

总结我三十多年宋史研究的历程,我始终牢记蒙先生“学问贵成体系”的教诲,尽力探究宋代的方方面面,期望最终在宋史研究上自

成体系,有所建树。

二

三十多年来,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大小小的文章约一百余篇。此次限于字数,精选二十六篇,编入本集。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五类,为八股文的起源,朱熹等人思想,王安石、范仲淹及其新法,各项政治制度,湖南经济开发等,其余社会风俗、农民起义、书评和序文等只能割爱。在各类文章中,尽量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类型排列。

我在决定文章的取舍时,主要从学术质量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兴趣等等。具体的想法如下:

1963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处女作《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一文。随后的两年中,在《史学月刊》和《历史教学》陆续发表了四篇论文。那时,正处于“文革”的前夜,国内政治气氛已逐渐向“左”转,阶级斗争之弦正在紧绷。在这种情势下,自己的文章尽管主要内容在探讨学术,但结尾部分有时不免对别人“上纲上线”地批评。现在读来颇感汗颜,不过在当时却是一件严肃认真之事,且报刊也鼓励作者这样做。以上五篇文章,本集均未收入。

十年浩劫中,一些特殊的原因促使自己仍稍有时间从事宋史研究。起初是参加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编写,接着是参加范文澜同志《中国通史简编》的续写工作,得以在1966年至1968年动荡不定的环境中稍稍腾出时间钻研宋史,阅读了一些史籍,摘录了许多卡片。1971年9月林彪一伙在蒙古粉身碎骨后,正在河南息县的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的阶级斗争气氛逐渐减淡,大家开始攻读外语和专业书籍。自己取出带下干校的南宋真德秀文集进行标点,并摘录卡片。1972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学部同志从干校搬回北京。随即,我回到了近代史所的《中国通史》编写组,在蔡美彪同志领导下参加《中国通史》辽宋金元部分的编写工作。

也许因为自己的天赋本身缺乏一种在疾风暴雨之中纵横驰骋的勇气和能力,所以在“文革”中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大批判”的文章。正因为如此,此次编选论文,就省去了剔除“糟粕”的麻烦,不免留下了一生中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空白。不过,在1975年初,自己曾应原学部《思想战线》杂志编辑部之约,撰写历史上宋江的文章。定稿后,编辑部打印出来,并拟刊用。不料,风云突变,“四人帮”刮起一股“批邓”的妖风,《思想战线》编辑部被打成“反革命复辟”的舆论阵地,这篇文章就此搁浅。“四人帮”垮台后,该文发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题为《论北宋末年梁山泊农民起义和宋江》。该文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仅最后投降,而且参加镇压方腊起义。1977年,在吴泰等同志与邓广铭先生争论宋江问题时,我觉得争论双方所持观点均有不足,关键之处都缺少史实依据,往往推而论之,所以又撰《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尚难定论》,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79年版)。该文提议双方进一步发掘史料。如今,邓先生和吴泰同志都已仙逝,宋江最后投降也成定论,当然仍遗留一些枝节问题如宋江是否参预征讨方腊、宋江是否复叛等尚待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篇文章此次也未选入。

在续写《中国通史》的过程中,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深入探讨了宋代的一些问题。诸如对于朱熹,尽管当时社会上“四人帮”正在大批特批,但我在重新系统阅读《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时,发现“四人帮”的“批判”往往歪曲朱熹的原意,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在抗金方面,朱熹一生前后有三种主张,但不失为爱国者。在内政方面,他一直主张“通变”,并提出了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具体主张。这些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写进《中国通史》,也没有胆量写成文章。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才动笔,写了关于朱熹政治主张的论文,送《历史研究》。编辑部采用了论文中朱熹主张抗金部分,题为《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发表在该刊1978年第9期。该文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朱熹并为朱熹平反的

文章。十年后,我将该文进一步修改和补充,题为《一论朱熹的政治主张》,发表于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和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朱熹改革内政的主张,写成《二论朱熹的政治主张》,刊登于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闽学渊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该文分为朱熹的“通变”理论、对改革时弊的具体主张、政见的实践情况等三个部分。稍后,读到广东王越先生所撰题为《南宋反道学的斗争》的一篇长文。该文旨在“肃清封建意识形态的流毒”,“批判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作者在宋史研究方面显然不深,因此错误俯拾即是。为此,我写成《评〈南宋反道学的斗争〉》一文(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新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对王文所述朱熹的一些问题逐条加以澄清。以上三篇文章,因字数较多,此次亦未收入。

在1977年至1983年间,我的文章主要是通过指出别人论文的缺失来阐述自己的见解。如前述《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又如《再谈宋墓出土的太学生牒》、《关于江阴北宋墓的墓主孙四娘子》,也是纠正文物工作者在解释有关出土文物方面出现的某些错误。再如《两宋时期的台湾》,也是指出有的学者在宋朝与台湾关系的论述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与之商榷。从1984年起,我开始正面论述宋代的一些制度、社会阶级、风俗习惯等。这一趋向以撰写《宋代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二文为起点。前文写于1984年,是为参加同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而写,后文是应《文史知识》之约为初学宋史者而写。后文共六篇,约四万字,因字数太多,此次亦未收入。

1989年,我撰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一文,近三万字。该文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经过有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到南宋中期已基本形成文章的八股体式,这是科举和学校考试的客观需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文经删节后,发表在1990年的《历史研究》上。我至今还认为,该文是在宋代科举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文学史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当然,

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

三

作为一名历史学工作者,研究宋史多年,深悉必须尊重历史。对于自己的宋史研究史,同样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同时,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宋代社会近三百二十年,涉及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几乎是无限的。自己决非才情卓越之辈,只是由于刻苦自励、勤奋读书,笨鸟先飞,舍得花时间去找书、抄录卡片、思考问题,才有今天的点滴成绩。但是,我不可能穷尽宋代社会的所有方面;加上自己的学术水平有一个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而由浅入深、由狭到广的发展过程,在文章中难免百密一疏,存在错误和缺点。所以,为了如实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我对此次入选的文章,一般不予改动,只在遇到确实排错的字句时,始加改正。

四

在我的治学生涯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十分艰难的。1970年即婚后的次年,就奔赴河南息县的原学部“五七”干校,爱妻郭玉琴便独自挑起了抚育第一个女儿的重担。1973年,生了第二个女儿。随后,除每月给我母亲寄生活费外,岳母不幸身患重病,日子更苦。在1974年至1977年这四年里,由于家庭负担增重,妻子不得不变卖自己的衣物以及我的一些尚值几钱的书籍。这时,还没有稿费收入,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不到一百二十元,日子达到了捉襟见肘、瓮粮不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她任劳任怨,全力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她在单位坚持做夜班,清晨回家后立即操持家务,直至下午才睡四五个小时,这样的景况几近十年,直到1984年底我调到上海师大工作,才有所好转。

夫妻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正是有了她的全力支持,使我无后顾之忧,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在宋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包含着她的一片心血。

五

1988年,庐山白鹿洞书院恢复建制,召开了成立大会,我受荐担任了院长。1990年,孙家骅同志担任书院管委会主任,提出要尽可能给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出版一册书。事隔八年,家骅同志调任江西省文物局领导之职,他依旧不忘此事,电告计划由书院资助出版我的论文集。得此喜讯,我立即着手选编此书。编成后,几经斟酌,拟以《廖城集》^①为名,藉此报答故乡嘉定父老的养育之恩。同时,在此谨向家骅同志和书院现任领导闵正国、高峰同志及书院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8年5月2日写于
上师大新邨22宿舍

^① 上海市嘉定区原名嘉定县,别称“廖城”。

目

录

序言	1
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	1
朱熹对时文——八股文雏形的批判	23
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	33
论朱熹的公私观	42
宋代理学家唐仲友	50
岳飞思想述论	68
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对王安石的论述	83
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	86
范仲淹与泰州捍海堰	96
再谈宋墓出土的太学生牒	107
宋代官员致仕制度概述	121
宋代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	141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	173
宋朝官员子弟初探	191
宋朝的岁币	215
宋朝的宫廷制度	234
宋高宗朝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	249
宋朝经筵制度	267

宋代的“借借”	310
论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	315
宋代佃客法律地位再探索	339
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	353
十至十三世纪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369
两宋时期的台湾——与张崇根同志商榷	384
大运河和唐、宋帝国的统一	392
《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伪作	416

宋元的时文

——八股文的雏形

宋元时期的时文，是专供贡举和学校考试使用的一种特定的文体。时文在宋代历经变化，最后定型为十个段落的体式，类似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最初，时文使用于贡举“三题”^①之一的“论”，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贡举改革后，扩大使用到经义。后来又推广到医学考试的脉义和假令论方义。于是经义和论、脉义、假令论方义等都开始使用这种特定的时文文体。

时文的文体，宋初使用骈文，仁宗嘉祐前流行险怪奇僻之体，从嘉祐开始推广古散文体。南宋前、中期，学者讲求文章的章法、句法等，评点之学兴起，散文写作技巧日趋严密，终于形成了一种近似明清时期八股文的新文体——十段文。

一、北宋的时文

八股文是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三合一”新文体。这种文体虽然正式确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但实际上早在宋代已形成了它的基本格式。

^① 据《文献通考·选举四》，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前，进士科殿试共考诗、赋、论三项，称为“三题”。

从宋太祖起,沿袭隋唐以来分科考试、选举人才的制度,并逐步创立了三年一试和三级考试(殿试、省试和乡试)、别头试、考卷实行糊名弥封、誊录、特奏名法等,使之不断完善。从仁宗起,正式建立太学,逐步取代了国子学;各类各级学校也大量兴建。神宗和徽宗时的两次兴学运动,基本建立了三舍考选制度。从此,朝廷的三级贡举考试和太学的三舍考选制度同时实行,互为补充,成为国家主要的取士途径。

宋初以后,时文的文体屡经变化。宋初沿袭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流行四六骈体文,称为“时文”。真宗时,杨亿、刘筠提倡以“雄浑奥衍”的文字革除其弊^①,但堆砌典故,辞藻繁缛,依然华而不实,号为“西昆体”。仁宗天圣初(1023),欧阳修应举时,见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撻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②。仁宗景祐初(1034)后,太学士人“各出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诋訕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贍”,称“太学体”。庆历间(1041~1048),朝廷多次下诏“丁宁戒飭”^③,但收效甚微。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极力排抑“太学体”。欧阳修倡导不受对偶、声韵和典故约束的古散文体,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神宗时期的贡举改革,士人考经义和论,又逐步形成了一种新体的时文。这种文体主张“推明义理之学,兼老、庄之说”^④。

嘉祐二年正月,苏轼参加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二段用“有一善”开头,紧接着对以第三段:“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以下又连用两行对句。过接几句散语后,再接连两行对句。三月,苏轼参加殿试,所撰《重巽以申命论》^⑤,文中用了许多字数多少不定的对句,而且出现了“官题”(考官出的题目)的痕迹。不过,苏轼并没有完全按照成格,而是自出机杼,

① 宋祁《景文集》卷五九《石太傅墓志铭》。

②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一《苏氏文集序》。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二月己卯。

④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⑤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七,载仁宗御试,亲出《重巽命论》题。

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各篇大义的写法并不雷同。

宋神宗时期,对贡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熙宁四年(1071)起,进士科停考诗赋、帖经、墨义,改考经义,以便“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士人各治《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分四场考试,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中书门下撰“大义式”颁行。^① 经义程文每篇不得超过 500 字。^② 同时,由王安石撰《字说》,王雱和吕惠卿、吕升卿等撰定《诗》、《书》、《周礼》义(即《三经新义》),刻板颁行全国,凡士子应试,“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③。哲宗元祐间,禁引用《字说》,改设经义和诗赋两科,停试律义^④。

为了配合贡举改革,王安石特撰一些经学小论文,作为“经义式”即士子考试经义的答卷标准。《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载有王安石“经义式”,收录了《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等六篇。其中最后两篇,均见于王安石的文集,改名《非礼之礼》和《勇惠》^⑤,正文个别文字也有所改动。以《非礼之礼》为例,该文第一段:“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紧接着就对一个第二段:“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⑥ 然后又以“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与下一段“盖知向之所谓礼者,礼之常,而孔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〇,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三。

③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吕公著》。

④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⑤ 《王文公文集》卷二八。

⑥ 《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此文时,可能为符合八股格式,删去了第二段,因为破、承不宜用对偶句。

子之事……使孔子蔽于制礼之文，而不达于制礼之意，则岂所谓孔子哉？”两两相对。而且不论破题、承题，照样使用对偶句式。

宋哲宗元祐间，张庭坚、马涓等四人擅名太学，号为“四俊”。张庭坚，字才叔，其经义程文尤为当代推崇。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时，收入张庭坚的两篇经义，一篇题为《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另一篇题为《惟几惟康其弼直》^①。明人（佚名）编《经义模范》一书，也收入他的《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等经义。尤其是《自靖》一篇，被后人视为经义的范文之一。^②《自靖》中，出现了明显的官题：“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然后转入原题：“盖于是时紂欲亡而未寤也……”《恭默思道》中，第一段写道：“静而虑者诚之至，感而通者诚之形。”以此作为破题，而且第一、二句为句法相同的对句。也出现了明显的官题：“‘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载于《说命》上篇。”然后转入原题。

从王安石、张庭坚的经义和苏轼的论，可以看出从仁宗到哲宗时期，还没有整齐严谨的八比，不强求对仗排偶，不完全禁止引证比喻，但已经出现了数量不等的比以及破题、承题、官题、原题等格式。这些格式是移植当时诗、赋破题等程式的结果。近体诗发展到唐代，日趋定型，在形式上要求句数和字数一定，某些句子必须对偶。应举诗中还出现了破题、颌比、颈比、腹比、后比、结尾等名目。^③ 北宋的论和经义不能不受到影响，逐步引入这些程式。嘉祐年间后，论开始用古散文体撰写；熙宁年间后，经义也加入这一行列。与此同时，论和经义又开始移植骈文的对偶句式，移植近体诗的破题、颌比等程式。三者逐渐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一种新文体的形成过程。

① 《宋文鉴》卷一一一。

② 见倪士毅《作义要诀》。《经义模范》录宋张庭坚、姚孝宁、吴师孟、张孝祥等四人经义十六篇，其首为《自靖》一篇。

③ 〔元〕王构《修辞衡鉴》卷一《诗体》。